

东北亚格局中的中俄关系

——俄罗斯学者观点评述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博士 关贵海

中俄关系的前景是20世纪世界面临的最不明朗的问题之一。虽然迄今为止这种关系一直相当友好,俄罗斯的学者们还是提出了中俄之间发生对立或冲突的可能性。特别是当人们把目光转向东北亚最广袤、最脆弱的土地——远东地区时,俄学者对中国扩张的担心远远超出了对俄日领土争端和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忧虑。

一、俄罗斯学者对其东北亚政策的不同看法

首先需要说明两点:第一,目前俄罗斯国际关系研究机构与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部门之间的联系已经远不象苏联时期那样紧密。学术界对现实政策的影响更多地是通过个人关系或者党派渠道。同时,绝对不可低估学者利用非常自由的新闻媒体和学术刊物对大众意识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第二,俄罗斯学者大多用缩写“CBA”来代表“东北亚”这个专用术语,广义是指北太平洋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中国、俄罗斯、日本、南朝鲜、北朝鲜和蒙古;狭义指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南北朝鲜。

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国际关系学者,包括东方学家和汉学家的观点受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影响,分化成许多流派、倾向。毫无例外,有两种极端的倾向。

一个极端倾向是某些学者们反对资本主

义改革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对外政策,支持社会主义倾向,并视其为俄国的传统道路,因而,一般被称为“传统主义者”。

与“传统主义者”针锋相对的是自称民主派的推崇民主和西方的学者们。他们与西方学术界联系十分密切,而且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来自西方(包括日本)。在俄著名报刊上,曾有文章专门就这类学者与西方的经济联系提出看法。^[1]作为对类似说法的佐证,《独立报》的专栏文章在俄情报机构提供的材料基础上,讲述了美国情报机关在俄罗斯政治界、学术界和军界人士中,大量培养亲美压力集团的具体数量和方法等。^[2]

在上述两种极端倾向之间,有许多过渡性的、中间的流派,其中,被国际学术界、尤其是美国学者称为“现实主义者”的著述影响最大。尽管这一派学者对俄现政权也很失望,但还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心存幻想,希望俄罗斯经过资本主义走向光明。然而,他们反对把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化,而是将世界政治中的力量均衡概念作为理论基础,并且试图从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出发分析和预测俄罗斯的外交方针。

根据本人留学俄罗斯期间的观察研究,对俄罗斯科学院主要研究国际问题并经常涉及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几个研究所,大体作以下划分: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属鲜明的民主派阵营,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中现实主义者与民主派平分秋色,远东所和东方学

所相同的是传统主义者略强于现实主义者，不同的是后者在对台关系问题上持非建设性立场。^[3]当然，这种划分是极其相对和有条件的，因为它纯属个人判断，学术界还没有认同：它的依据仅仅是这些研究机构的学者们有关东北亚国际关系和俄罗斯对该地区主要国家（美国、中国、日本、南北朝鲜）政策的学术论著。

在俄罗斯学者对其东北亚政策的研究中，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现象，第一，俄罗斯学者与国外同行合作著书，并在国外出版。所有经费，包括主要作者和主编前去参加首发式的费用及稿酬，由国外资助者支付，相应地，由出资者确定著作的思想政治倾向，俄方学者均乐于听命。不过，这一类著作仍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并由作者署名。如，哈巴罗夫斯克经济研究所和美国夏威夷大学学者合著的《太平洋地区的美苏经济关系：过去与将来》（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7年俄文版）。

第二，纯粹商业性的联系，即，某一个有外国政府背景的研究机构组织编写某一专题报告，执笔人绝大多数是俄科研机构的学者，他们只拿佣金，不署名。如，1996年4月，俄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部分研究人员，参与了日本政府出资组建的某研究所主持的关于俄罗斯经济改革的课题报告。俄裔旅加东方学学者奥·阿林披露了这一真相，并对报告中关于俄罗斯与亚太经济一体化关系的观点进行了全面批评。他认为，一体化和全球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等同；世界经济在未来10年中将发生剧烈的震荡，俄罗斯应该与世界经济保持一定距离；亚太是一个广阔而空泛的概念，甚至囊括了半个地球，把它称作世界增长中心显然不够严肃。^[4]

在俄罗斯与东北亚主要国家关系方面，俄学术界的看法大体上可以如下归纳：

1、关于对华政策

显而易见，民主派学者会坚决反对俄罗斯向中国倾斜，主张与美国、日本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其理由同他们的西方同行如出一辙：“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也就是在10年之内）可能成为俄罗斯最危险的外部威胁。”^[5]其中，俄罗斯国家杜马军控与地缘政治分委会副主任、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阿尔巴托夫的观点最鲜明，发表频率和范围也最引人注目。作为裁军问题专家，在研究了中国的军事规划和经济实力之后，他得出结论：中国对俄罗斯的威胁，哪怕再过10年也不会改变。不过，真正令他“担忧”的既不是现实的、也不是未来的中国军事威胁，而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因素。在他看来，日本才是俄罗斯的天然盟友，因为它与中国不同，是一个民主国家，是西方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6]尽管日本的民主也是相当特殊的，而且在政治上日本与中国有许多共同的方面。但对此他保持沉默。当然，他不是东北亚问题专家。

另一位著名学者C·列普科直接给自己的文章命题为：“我们永远都不会是盟友”。因为对于俄罗斯来说，中国是必然的敌人，或者“好战的力量”。他是从中国的军事学说中总结出这一观点的，尽管他从未指出过该军事学说在何时何地发表过。为了证明个人观点的可靠性，他在所谓英文材料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武装力量在1994年初已达到481万人，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290万人”；他还说，由于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英国“未经武装反抗就同意了在1997年把最富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岛交给中国”。^[7]这位历史学博士显然不知道19世纪的鸦片战争、1898年的中英香港租借协定和1984年的中英关于1997年将香港归还中国的协定。

如果说上述两位专家涉猎东方学属于偶

然，所以其观点的偏差尚可谅解，那么，职业东方学家伊·采里谢夫的轻言就令人无法理解了。他认为日本对中国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的武装力量，特别是海军的扩大与现代化速度惊人”；^[8]而对于日本扩大军备，尤其是海军，采里谢夫却视而不见。

简而言之，俄罗斯的民主派学者比美国人更担心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然而，不难看出，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军事力量，而是政治偏见，似乎所有这一切都因为中国是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在他们看来，作为民主国家的俄罗斯应该离中国尽可能远一些，或者说只维持一般的经贸关系。

几乎所有传统主义者和多数现实主义者持相反的立场。如Г. 特罗菲缅科认为，“旨在加速改善和长远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并最终与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政策，无疑是俄罗斯领导层的明智选择。”^[9]这种政策不仅可以继续中俄边境的非军事化进程，而且可以使俄罗斯有机会利用中美之间业已增长的利益冲突。当然，这种政策的作用不是无限的，因为中俄接近的程度不可能超出美国所能容忍的范围。^[10]

2、对日关系

俄罗斯与日本的政治关系是其东亚外交中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是其学者立场分歧最尖锐的方面。由于北方领土问题，俄罗斯至今未能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令俄罗斯学者中的现实主义者和民主派忧心忡忡。他们组成亲日压力集团，坚决主张把北方四岛归还给日本。当然，主张归还的依据略有差异：有的认为归还后可以使俄日关系出现重大飞跃，而俄日关系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的迅速巩固是维护俄罗斯远东地区安全的关键所在；^[11]有的认为归还领土可以推动日方扩大对俄投资；^[12]也有学者仅仅出于公正原则主张归还，并认为无条件地归还有利

于树立俄罗斯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形象。^[13]

传统主义者反对归还的立场十分鲜明，而所持依据也不尽相同。一些人认为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日本人用战争手段取得的北方土地（1904—1905），苏联用同样方法夺回（1945），属天经地义；（2）既然日本不肯还给中国钓鱼岛，俄罗斯又何必急于归还，应该等等看。^[11]另一些学者认为，北方领土问题不仅仅是俄日两国之间的问题，它同中国与台湾的关系一样，产生于雅尔塔体系，属于历史范畴。简而言之，中国不会放弃对台湾的主权，俄罗斯同样没有必要归还北方四岛，以免破坏战后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法律基础。^[15]

3、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在对南朝鲜的政策问题上，俄罗斯各派学者的观点没有明显的对立，只是在对北朝鲜关系上有一些微弱的差异。因为在今天的俄罗斯社会，旗帜鲜明地支持北朝鲜必然会被认为是不明智之举。所以，现实主义派学者的观点具有更大市场。

他们认为，如果说同南朝鲜关系正常化是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胜利，同北朝鲜关系的恶化则是明显的失误，它使俄罗斯被排挤出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主动权被美、中、日掌握。如果说俄罗斯政策的本意是加强同南朝鲜的经济关系的话，那么，它会吃惊地发现，在签署与俄友好合作条约后，南朝鲜迅速丧失了对俄经济合作的兴趣。因为，从戈尔巴乔夫时代起，南朝鲜对俄政策的根本目标就是使俄罗斯对北朝鲜产生影响，以利于南北双方和平统一。所以，当南方发现俄罗斯对北方已经没有影响力时，发展对俄经济关系的动力也就大大打了折扣。随着北方领导人的更替，俄罗斯应该利用时机同北方签订新的政治条约，在确保俄罗斯不承担南北双方冲突时对北方的义务的情况下，给北方

一种合理的政治保证,使北方不致于过分担心外来的武装颠覆。并且,俄罗斯和中国同北方的双边条约关系,客观上可以把北方纳入东北亚的安全格局中,并在南北对话或美朝对话中起一种建设性的保障作用。一句话,俄在朝鲜半岛的政策目标是,在南北统一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尽可能使俄罗斯与统一的朝鲜的关系不亚于中俄关系的水平。

二、俄罗斯学者眼中的东北亚格局

从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东北亚的安全格局是由美苏两极构成的。从60年代初起,中国开始扮演地区强国的角色,东北亚的关系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描述成三足鼎立,尽管中国一方的总体实力远无法与另外两“足”相比。70年代,日本经济的崛起使它成为继中国之后的又一个地区强国,两极格局进一步受到削弱,但美苏仍旧具有绝对的优势。

时至今日,东北亚地区业已形成了一种层次化的关系模式,即,总体实力上,美国是地区格局中绝对佼佼者;军事上,美俄保持着两强地位;日本和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各有优势,两者的总体实力无法比较。所以,这种层次化的关系模式带有鲜明的过渡性质,它集单极、两极和多极的因素于一体。

层次化模式是东北亚地区能够在冷战结束后保持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里没有形成类似于北约和华约的两个对立的垂直型力量中心,所以稳定的形成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地区性不稳定因素的排除基本上是通过低一级层次的国家迫使高一层次的国家参与对话来实现的。

90年代中期,在东北亚地区安全框架中,中国在南沙群岛和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地区安全的焦点,而美国同日本和南朝鲜的军事同盟关系是维护地区安全的稳定因素,俄罗斯是介于两种力量中间的成分,同样起

着稳定的作用。

自从俄罗斯改革开始以来,其东北亚政策一直被一个理论性的问题所困扰:俄罗斯在后冷战时代的东北亚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1986年以后的“政治新思维”外交仅仅使当时的苏联停止扮演“破坏者”的角色,而建设性的政策至今仍没有形成。

在缺乏正式的亚太政策学说的情况下,俄学者试图通过分析俄政府实际做法找出动机和规律,并自下而上重新构成俄罗斯的东北亚外交学说。

俄一些学者指出,戈尔巴乔夫的东北亚政策基本上是在“机会补偿”的原则之上,而叶利钦的路线可以描述成“合理收缩”学说。第一种情况指的是,苏联浪漫而又固执地希望在减少自己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的同时,能够在参与地区政治和经济事务的机会方面得到相应的补偿;第二种情形指的是,俄方希望使自己从东北亚地区的退却显出可控性,并暗示俄方将有意识地收缩影响范围。

俄罗斯学者认为,当前俄对东北亚政策的核心问题是方向选择。可选择的方案起码有以下三个:(1)建立同中国的特殊关系;(2)模仿中国自1982年以来实行的等距离外交方针;(3)寻求把维护俄罗斯国家利益与加入美国领导的东北亚安全体系结合起来的途径。

多数俄学者认为,第一种方案的可靠性如同苏联30年代末对苏德同盟永久性的期望一样令人怀疑。当然,把今天的中国同纳粹德国相比是很荒唐的,但是,不能不看到地缘政治上的相似之处:苏联向波罗的海和黑海发展的倾向,同德国获得罗马尼亚、中东石油及东欧“生存空间”的梦想导致了激烈的冲突;今天的俄罗斯需要自由进入太平洋的通道,而中国不会放弃对当初中国的经济、文化影响占优势的俄罗斯黑龙江沿岸、海滨海疆区的追求。也就是说,导致历史上俄

罗斯同中国之间冲突的地缘政治因素并没有消除。

反对第二种方案的学者认为，它明显是力量均衡政策的翻版，旨在维持地区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不允许其中任何一方处于绝对优势。问题是，俄罗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可能成为亚太地区平等的一员，也就谈不上跟谁保持等距离。这只能给中国提供机会放手在地区事务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并将削弱俄罗斯在中国面前的地位。在俄罗斯对美和对华政策上的等距离，无疑是地缘政治上的荒唐之事，因为在东北亚，俄罗斯只能拉开同美国及其盟友的距离，而中国会永远笼罩着俄远东地区。这样一来，俄罗斯在地区安全问题上除了依赖中国再无路可走。

第一和第二种方案的合理因素在于探索俄远东与中国关系的最佳模式。莫斯科不可能随意疏远同中国的关系，更不能拖延边界划分工作，否则让中方得到口实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俄方的损失将是今天远东个别地区所承受的损害无法比拟的。

第三种方案的依据是，东北亚地区安全既离不开中俄睦邻友好关系，也不能没有对中国的国际政治行为的有效制约，特别是当其行为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时候。于是，俄罗斯学者提出了“软遏制”政策。所谓“软”，就是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对抗，同时通过参加以美国为首的、并不直接反对中国的亚太战略体系，向中国发出信号：在必要的时候，俄罗斯会依靠美国及其盟友的支持。俄罗斯不会忘记，相对于中国来说，它所拥有的最大优势是它与西方保持着更加信任的政治关系。

在和平条件下，中国有极好机会实现相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方面的巨大优势。它可以通过非军事手段，包括把过剩的人口引向人烟稀少的俄远东地区。因此，必须重新考虑俄罗斯在东北亚战略伙伴的问题。也就是说，俄罗斯必须在美国的东北亚

战略体系中谋求一个积极的角色，因为这一体系的长远任务显然是遏制中国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难以预料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讲，改善对日关系已经不是目的，而是俄罗斯进入以美国为首的东北亚战略伙伴关系体系的必要条件，因为俄日关系越紧张，俄美在东北亚的合作就越艰难。这样一来，北方领土问题的解决就具有了又一层意义，因为“离开领土问题而空谈俄日关系的重大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16]

三、对中俄关系前景的判断

在东北亚的特定条件下，除了对俄、中、美、日四国之间战略平衡的考虑之外，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未来走向也成为倍受关注的焦点。俄学者对远东地区自然地理条件的认识出入不大。一般认为，一方面，俄是东北亚地区的大国。从贝加尔湖到太平洋沿岸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共计620万平方公里，占俄领土的36%；资源非常丰富，如，占俄天然钻石的98%，黄金的50%，渔业产品的58%等等；换句话讲，俄远东地区是东北亚地区的最后一块处女地。另一方面，俄远东地区的地位非常脆弱。该地区气候条件恶劣，90%的土地属于永久冻土带；人烟稀少，约816万人（1992年）；与欧洲部分的交通、通讯联系十分不发达；虽然海岸线很长，但只有海参崴和纳霍特卡是不冻港，这使该地区无法一年四季自由进入太平洋。结果是，俄罗斯需要面向亚太，却又不能直接做到，而是要经过相邻的中国和朝鲜。

在上述背景下，俄学者发现，在国防事务绝对服从中央的前提下，俄罗斯中央政府对远东有4种不成文的政策倾向：

- 1、建立几个类似于中国特区的经济接辖区。这种区域在形式上已在纳霍特卡建立，只是还没有法制方面的优惠，以沿中俄边境和中方参与为主。

2、保持远东地区原材料出口的地位，同时加强初级加工业，并在哈巴罗夫斯克的航空港和海参崴海港的基础上，提高包括货物过境在内的运输能力。

3、把远东作为原材料和生态的宝库加以保护，主要发展城市设施和旅游业、金融业。

1、改进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设施，为开展国际商贸、金融业务创造良好环境。

尽管上述政策倾向都不是正式的，而且互不相容，但都不主张在远东实行东亚式的再工业化。^[17]这在俄学者看来是因为：第一，吸引外资的现实可能性不大。他们认为，整个亚太地区最活跃、最有前途的投资者有日本、台湾、新加坡、香港和南朝鲜。其中三个与中国拥有相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其资本的投入水平与对俄罗斯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威胁程度是成正比的，俄应尽量回避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俄直接投资；俄希望日本能扩大对俄投资，只是出于政治上的偏见和猜疑，加上北方领土问题，日本并不愿意向俄投资；结果，只剩下南朝鲜了，在俄难以对北朝鲜施加影响的情况下，南朝鲜的投资意向也一样不明显。远东地区陈旧的设备、落后的技术和基础设施以及涣散的纪律，也使投资者望而却步。

第二，远东地区劳动力资源严重缺乏，只能从外部引进。俄学者认为，引进的主要来源是中国，而中国对俄远东人口压力和扩张威胁让俄国人提心吊胆，因为：中国东北人口稠密而资源短缺，而俄远东正好相反；俄政治经济制度比中国更自由，更有吸引力；俄在中俄边境的驻军从1989年的32.6万人锐减到1993年的20万，自然加重了俄边民的心理压力；更令远东居民恐惧的是对蒙古人统治俄罗斯240年历史的记忆。这样一来，同中国搞经济合作的客观需要，一方面促使远东地区把目光从欧洲转向东北亚，同时又由于对中国的怀疑使地方政权更注意联邦的团结，以求真正保证远东地区的安全。

由于不能吸引外资，不能实现东亚式的再工业化，也就意味着俄不能真正加入亚太经济一体化，而是在一定的时期里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边缘地带。

在俄学者看来，这种边缘地位对俄具有难以料想的意义。这是由亚太一体化模式决定的。一般认为，欧洲一体化的特点是向大陆内侧扩展，并且全面、均匀；亚太一体化是向海域扩散，并且更多是只包括某一国家的某一部分，不均衡性非常明显，尤其是对中俄一类的陆地大国来说，更是如此。

俄学者指出，从理论上讲，鉴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中心地位，如果让北美东亚的发达地带与欧亚大陆东部的欠发达地区的分界线贯穿中国的话，中国会处于极其难受的境地，甚至会造成地缘经济或者政治上的分裂。为了避免这种局面，中国政府一方面力图促进内地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有意限制沿海地区的开放程度，以免因差距过大造成国家分裂。然而，相关国家又希望中国深化开放、加速一体化进程。结果是中国将面临分裂以及与邻边国家在亚太经济合作问题上产生摩擦的危险。

同中国相比，虽然俄罗斯的边缘地位使它在地区中的经济地位十分脆弱，但在政治上却可以避免分裂。只是中国在远东地区的渗透，在俄国大多数学者看来，是无法避免的、也是令俄罗斯无可奈何的事情。他们只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从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大局出发，承诺不把成千上万中国人在俄罗斯的存在作为向俄扩张的理由，并且明确否认这些移民还是中国公民，拒绝为他们做任何事情。^[18]

我的几点结论：

1、中国对俄远东地区形成的人口和经济压力，是在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日趋缓和、经济和人员往来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一种非政策

性的自然现象。俄罗斯的研究人员对中俄在远东地区力量对比变化的忧虑属于正常反应。当然,俄方必须从制定科学有效的经济政策、法规出发,促进远东地区的经济和人口结构的正常发展;而中方则应尽量避免提出一些对俄远东地位来说比较微妙、比较有刺激性的建议,比如,向远东大量输出劳动力、联合开采石油天然气等。我想,在这方面也能体现出东方的外交艺术,即,让对方自己讲出你想说的话,而不必事事都要明说。此外,不必在历史问题上纠缠不休。用中国在百年之间失去过百万平方公里国土的事实来教育国人,其目的主要是证明,一个民族只要落后和不团结就会蒙受耻辱的道理,而不应该具体地有所指,无形中让人感到中国随时都会提出收回失地(特别是远东)的要求。

2、如果说俄罗斯学者对中国人口压力的担忧多少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关于中国发展武装力量威胁到俄罗斯的说法显然缺乏依据。作为反证可以发现这样一些事实:第一,中国的裁军政策是一贯的。比如,中共十五大再次提出裁军50万人。至于中国在防御性国防方针的前提下,为促进国防现代化而采取的一些步骤,如进口部分先进武器和技术等,均未对地区局势产生重大影响。俄罗斯一些学者对美国向台湾大量出售现代化军事装备的做法保持沉默,却无视中华民族统一自己的领土台湾的意愿和决心,竟然主张俄罗斯持反对武力统一台湾的立场。这种态度起码说是不负责任的。

3、尽管东北亚地区至今保持着一种动态安全的格局,^[19]但从亚太地区的长远发展来说,这里毕竟需要一种既不同于北约、也不同于美日、美韩安保条约的全新的地区安全模式。中国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中俄与中亚3国签署的关于加强边境地区军事信任的协定(1996年4月,上海)和关于相互裁减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协

定(1997年4月,莫斯科)。面对这一事实,俄学者却提出俄罗斯应加入旨在遏制中国的、以美国为首的东北亚安全体系,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显然,这已经不是学术上的分歧了。

注释:

- [1] Арин О. Анатомия подкупа. Правда, 5 декабря 1995 года.
- [2] Пванов П. Нов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активности ЦРУ.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7 июля 1996 г.
- [3] 据俄通社一塔斯社1995年6月22日报道,在俄科学院东方学所主办的题为“台湾与联合国”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有人公开提出应该让台湾以观察员或联系成员国的身份加入联合国。
- [4] Арин О.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й регион: мифы, иллюзии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М: Наука, 1997, с. 326~327
- [5] Арбатова А. Росс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90-е годы-МЭМО, 1994, No. 8~9, с. 15.
- [6] 同上。
- [7] Ренко С. Мы никогда не будем союзниками. Приложение к “Независимой газете”, 18 июля 1996 г.
- [8] Целищев С. Я понял как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артнер. МЭМО, 1994, No. 6, с. 71.
- [9] Трофименко Г.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США в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США-ЭРИ, 1996, No. 1, с. 33.
- [10] 同上, 第36页。
- [11] Арбатова А., там же.
- [12] Запцев В., Славинский Б. Россия и Я понял: 40-летие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ЭМО, 1996, No. 10, с. 98~99.
- [13] Титаренко М. Россия и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 М.: Фабула, 1994, с. 163.
- [14] Арин О.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й регион: Мифы, иллюзии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с. 323~324.
- [15] Мясников В. Второе вхожд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в Китай. Сегодня, 18 апреля 1996 г.

[16] Целищев С., 同上注, 第 75 页。

[17] 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 50 周年纪念会上,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通讯院士把俄远东同亚太合作的模式归纳成 6 种: 高科技型、原材料型、工业化型、移民型、区域化型和环境型, 并强调其他国家的参与。参见《今日东欧中亚》1997 年第 3 期第 2 页。

[18]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中研究中

心副主任阿·沃兹克列先斯基语。

[19] 俄科学院美加所美国欧亚政策研究室主任博加杜罗夫认为, 欧洲的安全模式具有静态特征, 有严格的组织结构和明确的功能界定; 亚洲, 包括东北亚的安全模式缺乏明确的组织结构和功能, 而且更多地是通过一部分国家迫使地区强国加入区域安全问题对话, 并使其不断规范自己的国际行为。

(上接第 140 页)

注释:

[1] 夏光:《论作为基本人权的环境权》,《中国环境报》1997 年 7 月 12 日。

[2] 董云虎、刘武萍编:《世界人权约法总览》,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403 页。

[3] 转引自韩德培主编:《人权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0 页。

[4]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9 页。

[5]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见中国环境报社

编译:《迈向二十一世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献汇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9 页。

[6] 在关系到自身实际利益的一些具体的环境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内部和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一些矛盾。

[7] 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秘书处编:《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文件汇编(二)》,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2 页。

[8] 徐嵩龄:《外部世界对中国环境能力建设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 年第 11 期。

[9] 同注 [7], 第 445 页。